

# 张楷《圣迹图》的几个问题

陈 东

**摘要** 所谓元代画家王振鹏所作《圣迹图》,其实是明万历年前后的假托,其构图及序、赞均抄自明张楷的《圣迹图》。明张楷《圣迹图》原赞词有“夷不谋夏”、“用夷遏夏”的字句,清康熙年间有所篡改。张楷《圣迹图》最大的失误是为“先圣小像”配上了“述中庸赞”,误将孔子与颜回当成了孔子与子思。何珣所增补九事,其中“观庙敬器”一事两图,国内版本皆已遗失,仅存日本。

**关键词** 圣迹图 张楷 何珣 孔子全书 孔宅志

**中图分类号** B2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627(2019)02-0083-11

**作者:** 陈东,男,1963年生,山东钜野人,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为鲁国史、儒家文献。山东 曲阜 273165

学界对明张楷(1398—1460)所编《圣迹图》的研究开始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郑振铎指出“这部正统本《圣迹图》在中国版画史上是一部珍奇的大作品。在十五世纪中叶,中国木刻画的创作是相当寂寞的,不意中却出现了这部奇花,怎不值得我们特别重视!”<sup>①</sup>其后半个多世纪,《圣迹图》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我们已经知道郑振铎所说的正统本《圣迹图》并非正统九年初始本,而是后来的增订本。有些前人未见的版本重新面世,让人眼界大开。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许多细节问题逐渐暴露,又产生了更多的研究课题。

## 一、张楷《圣迹图》与所谓王振鹏《圣迹图》

上世纪初的1908年,神州国光社出版了邓实编《神州国光集》增刊二,其中有元王振鹏(孤云)画、俞和(紫芝)题《圣迹图》。邓实践文云“此图旧藏项子京家,庚子之乱,为英人某君购得。余亡弟秋门之妻弟杨君寿彭在日本从某君借影以遗余。”依邓实践,英人某人及所谓元王振鹏手绘《圣迹图》早已流传国外,时存日本。191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孙毓修编《圣迹图》,孙毓修在该书之序中说“尝览唐宋名画录,有《圣迹图》。知古者良工写画必取其有补于世道人心者而作焉,非苟然而已也。今其画亡矣。后人即怀此志,然不求古本,即凭近世之画师依稀想像而摹吾夫子之衣冠道貌,是褻也。后见元人孤云手画《圣迹图》,布景设色皆非近世所有,穆然如见,燕居申申,与夫一车两马,悲天悯人,栖栖遑遑之概也。孤云生当民国前七百年,其所据当是唐宋古本,而非依稀想像

<sup>①</sup> 《中国古代版画丛刊》第1辑《圣迹图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92页。

以摹吾夫子之衣冠道貌也可知。顾其画自降生至崇祀 逾十幅而止。证以《史记·世家》则其事之遗漏者多矣。”终因王振鹏《圣迹图》画幅太少,改从曲阜孔庙石刻本《圣迹图》中选取32幅,成就了第一部英汉双语《圣迹图》。孙毓修所见王振鹏绘《圣迹图》恐怕就是神州国光社的出版物。

1928年的《非非画报》选载元王振鹏绘《圣迹图》三幅,编者志云“王振鹏字朋梅,元仁宗赐号孤云处士。善楼阁界画。为元代能手。此册共十帧。杜君其章最近往广州,得之于城西某故家。此册人物栩栩若生,设色文静,相貌严肃,而俞紫芝之题字,乃逼肖松雪。杜君至宝爱是册,不轻示人者也。”如所言属实,则此所谓王振鹏绘《圣迹图》似乎又回流到了国内,但此后不知所踪。鲁迅《壬子日记》(1912年)及马场春吉《孔孟圣迹图鉴》(1940年)所言王振鹏《圣迹图》皆为神州国光社的影印本。

1994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长阳县图书馆所藏《圣迹图》,徐孝宓在前言中将传世的明以前的《圣迹图》版本分为四大系统,元王振鹏绘图本《圣迹图》名列四大系统之首。国内学者由此几乎众口一词,都承认元王振鹏手绘《圣迹图》乃真实存在。如2003年,沈津著文说“《圣迹图》有绘本、石刻本、木刻本三种类型。绘本最早,据传为元代画家王振鹏所绘。振鹏,字朋梅,浙江温州人,官至漕运千户,界画极工,仁宗眷爱之,赐号孤云处士。其运笔和墨,毫分缕析,左右高下,俯仰曲折,方圆平直,神气飞动,不为法拘。此图共十幅,旧藏明代重要收藏家项元汴天籁阁,后流落到日本,光绪三十四年由邓实予以影印,有上海神州国光社影印本。”<sup>①</sup>张国标《徽派版画》沿续了徐孝宓的见解,分元、明时期《圣迹图》为四大版本系统,以王振鹏《圣迹图》居首<sup>②</sup>。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孔子圣迹图》序文也说“《圣迹图》系采择孔子故事,绘制成系列连贯的图画,材料多取自《论语》《史记》二书,有绘本、刻本、石刻、拓本等多种版本类型。绘本出现最早,据说唐朝已有,但未见传世。现存最早之绘本为元代画家王振鹏所绘,图共十幅,旧藏项元汴天籁阁,后流落到日本。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由邓实影印,有上海神州国光社影印本”<sup>③</sup>。

这一观点也得到了韩国、日本学者的赞同。韩国学者赵美善认为“从现存的资料来看,时期最为久远的是元朝时画家王振鹏(字朋梅,号孤云处士)作的画,与此相关的记录在鲁迅的《壬子日记》或马场春吉的《孔孟圣迹图鉴》中虽然也有陈述,但是确切的根据就是我们国立中央博物馆收藏的金振汝所摹《圣迹图》上面的跋文。”<sup>④</sup>日本学者竹村则行为此写有专文,题目就是《明张楷圣迹图赞抄袭了元俞和圣迹图赞》。文章将王振鹏《圣迹图》与张楷《圣迹图》相比较,得出了张楷《圣迹图》明显模仿了王振鹏《圣迹图》的结论<sup>⑤</sup>。其实这也难怪,只要承认元王振鹏《圣迹图》是真的,就只能得出明张楷《圣迹图》抄袭的结论。

美国学者孟久丽(Julia K. Murray)则认为王振鹏《圣迹图》是典型的“苏州片”,即假货、赝品、仿冒品。孟久丽在其著作中说“有两幅绘画版本的《圣迹图》中的特点与本章前述的苏州片相符。两个作品现在都下落不明。它们各自只有十个画面,都自称其中的绘画和书法是由著名画家和鉴定家所作。其中一幅是与仇英(约1494—约1552)的画风相似的手卷,而假称其中的文字是由文征

① 沈津《圣迹图版本初探》载《孔子研究》2003年第1期,第102页。

② 张国标《徽派版画》,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1页。

③ 张楷《孔子圣迹图》,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页。

④ [韩]赵美善《孔子圣迹图考》载《美术资料》六〇,国立中央博物馆1998年。

⑤ [日]竹村则行《元俞和「孔子聖蹟図」賛を踏襲した明張楷「孔子聖蹟図」賛について》,载九州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所《文学研究》107卷,第37—68页。

明写于 1538 年。另外一个版本的《圣迹图》是一套册页,它被全部翻刻在 20 世纪早期的出版物里,并且还对它们进行了论述。这个册页假称是由王振鹏所画,其中所题的文字后面还有俞和(活动于约 1330—1360)的落款,但这些文字实际上是由张楷直到 1444 年才作成的说明和赞词。这个册页上还带有各种各样的手迹写成的题跋,并且假称它们的作者是袁桷(1266—1327)、詹希元(活动于约 14 世纪后半叶)、邵宝和文彭(1498—1573)。在这个册页上的有各种不真的名收藏家项元汴(1525—1590)的印。”<sup>①</sup>笔者完全赞成孟氏的判断。孟氏的判断依据是参照《养正图》手卷的惯例,《圣迹图》的证据只有“其中所题的文字后面还有俞和的落款,但这些文字实际上是由张楷直到 1444 年才作成的说明和赞词。”这对日本、韩国学者而言似乎缺乏说服力,因为竹村则行认为张楷《圣迹图》的赞也是抄的。

笔者认为无论是构图还是文字内容,都能证明王振鹏《圣迹图》为后人假托。

先看历史记载。与张楷同时的杨守陈(1425—1462)、吕原(1418—1462)、李贤(1408—1466)分别为张楷所写的《行状》《墓志铭》《神道碑铭》以及《宁波府志·张楷传》都明确记载“楷尝汇集孔子圣迹三十四,各为图赞,镌石语家。”至于王振鹏绘制《圣迹图》,不但虞集所写《王知州墓志铭》只字未提,各种《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画谱均未曾涉及。最早的记载大概是金振汝(1675—1760)所摹王振鹏《圣迹图》。金振汝为朝鲜肃宗朝宫廷画师,此摹本约绘于 1700 年。

金振汝所摹王振鹏《圣迹图》与神州国光社所影印王振鹏《圣迹图》虽然都是十幅,但几乎没有重合。神州国光社影印本王振鹏《圣迹图》为:尼山致祷、受乐去鲁、匡人解围、微服过宋、学琴师襄、西河返驾、子西阻封、杏坛礼乐、西狩获麟、汉高祀鲁。朝鲜画家金振汝所摹王振鹏《圣迹图》(现藏韩国国立全州博物馆)为:俎豆礼容、退修诗书、子路问津、夹谷会齐、问礼老聃、适卫击磬、灵公问阵、宋人伐木、诛少正卯,第 10 幅题目不详<sup>②</sup>。巧的是二者都不出张楷《圣迹图》的范围,构图也基本上与张楷《圣迹图》相同,些微不同的是人物的多少和背景的增减。金振汝所见王振鹏《圣迹图》有神州国光社影印本王振鹏《圣迹图》所没有的明人吴奕和宋燧的跋文,这说明二者是两个不同的绘本。一般来说王振鹏不可能有两套手绘本《圣迹图》传世,现在出现两套同为王振鹏所绘的本子,只能证明二者皆为假冒。赵美善《孔子圣迹图考》竟由此推测金振汝所见王振鹏《圣迹图》原有 32 幅,更是不可思议。

2010 年 10 月,第二届北京中国文物艺术品博览会展出了一幅传为五代南唐周文矩手绘《圣迹图》(也是 10 幅),有元仇远、邓文原跋,有明贡师泰、丘子沾、杨基、清乾隆帝收藏印。乾隆《御制文二集》卷十八《大禹治水图题语》:“《大禹治水图》……故无作者及收藏家姓名、印识。按……此幅或即文矩所为未可知也。且与内府所弃文矩《圣迹图》笔意亦有相仿者。”<sup>③</sup>说明此画确实有来历。但这显然并不能证明此画即为周文矩真品,只能证明乾隆时期《圣迹图》贗品已经流行,清代皇室所收亦难免假货,何况金振汝是一外国人,更是难辨真伪。

再看序、赞部分。张楷《圣迹图》跋明确说“楷辑是图,每事则取《史记》所载,为之序、赞书,以其详而可考也。至于卷首总序,则全录文公所纂者,以其约而有断也。”邓棨跋文说“余友张君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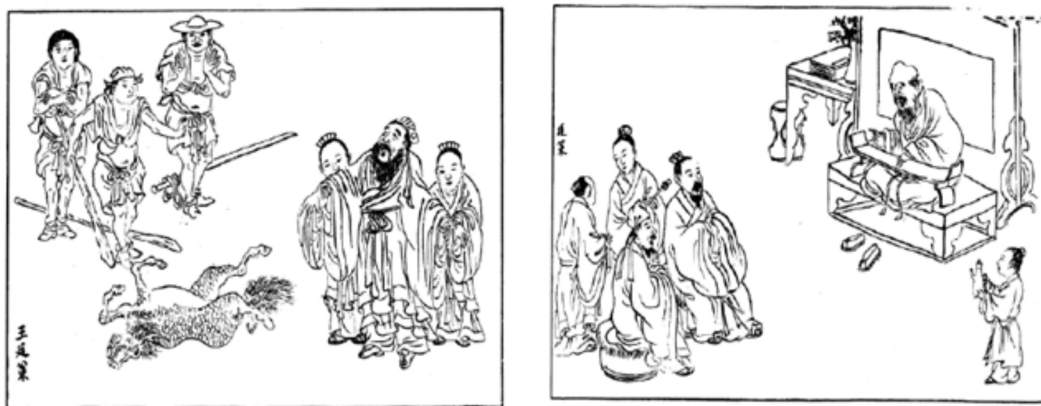
① [美]孟久丽《道德镜鉴:中国叙述性图画与儒家意识形态》,何前译,北京,三联书店,2014 年版,第 203 页。

② 张楷《圣迹图》、传王振鹏《圣迹图》皆无题。四字题目为笔者参考后世《圣迹图》所加。下文同。

③ 《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 10 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 699 页。

笃学尚文,志希圣道,尝取《史记》所载夫子出处之迹,择其有关大节者,得二十七事,兼取《家语》所录征在禘于尼山及《孔丛子》所述夫子泣麟二事,绘而为图。每事摘《史记》全语著于其上,各述一赞,以揄扬圣征,将命工勒石,以贻永久。”据此,张楷《圣迹图》中的序、赞皆为张楷所撰,聘人书写。王振鹏《圣迹图》则只是说“俞和题”,没有明确撰人。最近雅昌拍卖出现的刘松年(1155—1218)绘《圣迹图》卷轴,也是十幅(与所谓王振鹏所绘《圣迹图》十幅有四幅重合),“序”的落款竟然也是“紫芝山人俞和敬记”,极有可能与所谓王振鹏绘《圣迹图》出自同一画匠之手,伪劣之迹不打自招。

再从构图上看。传统绘画权威画谱《芥子园画传·人物》作为绘画范本,临摹有唐吴道子的“先圣像”、宋李公麟的“至圣先师凭几像”和“孔门七十二弟子像”,还收有元赵雍(1289—1360)《圣迹图》两幅(学琴师襄、女乐纹马),明王廷策(万历时期人)《圣迹图》两幅(西狩获麟、问礼老聃)(图1)<sup>①</sup>。张楷《圣迹图》、王振鹏《圣迹图》也都有这四幅图。赵雍为赵孟頫(1254—1322)次子,元初著名画家。王振鹏、张楷《圣迹图》若有所吸取,不足为怪。至于元代高手王振鹏手绘《圣迹图》竟然采用明代不甚有名的画家王廷策的图本,实在是不可思议。如王振鹏确实绘有《圣迹图》,《芥子园画传》不可能舍弃名家王振鹏而以王廷策为范本。张楷以诗人闻名,其《圣迹图》乃雇人绘制。万历时期张楷《圣迹图》广为流传,各种石刻、木刻、绘本《圣迹图》一起涌现,其时王廷策以此成名,却是非常有可能的。



图一

再从叙事内容看。叙事内容大多摘取古典成文,张楷、王振鹏《圣迹图》叙事文字大多相同。但如张楷跋所言,张楷《圣迹图》二十九事,二十七事选自《史记》,只有“禘于尼山”和“夫子泣麟”二事分别选自《孔子家语》和《孔丛子》。因此张楷《圣迹图》叙事大多采自《史记》成文,唯独“禘于尼山”和“夫子泣麟”有特殊说明。王振鹏《圣迹图》恰好也有这两幅图,比较如下:张楷《圣迹图》“禘于尼山”图序赞“按《家语》云:孔子母征在禘于尼山而生孔子。首上圩顶象尼山,因名丘字仲尼。《史记》虽不载其事,然实诞圣之本,故录于首云。赞:尼山岩岩,鲁邦是瞻。降灵自母,孕圣归男。既验以形,遂征以名。一诚感格,万古文明。”事见《孔子家语·本姓解》。其实张楷叙事有误,《史记·孔子世家》明文记载:“(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禘于尼丘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

<sup>①</sup> 巢勋临本《芥子园画传》第四集“人物”,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233—234页。

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 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 姓孔氏。”大概是因为《史记》有“野合”的字样，张楷不愿道及。

王振鹏《圣迹图》“祷于尼山”图序赞与张楷序赞完全相同，连其错误之处也一并承袭，只是省略了上文下划线的“首上圩顶象尼山”七个字。俞和与张楷的“序赞”不可能如此巧合。

张楷《圣迹图》“夫子泣麟”图序赞“十四年庚申，鲁西狩获麟，孔子感焉，作《春秋》。按《孔丛子》曰：叔孙氏樵而获麟，众莫之识，弃之五父之衢，冉有告曰：麋身而肉角，岂天之夭乎？夫子往观焉，泣曰：麟也。麟，仁兽，出而死，吾道穷矣！赞：王降而伯，雅亡而风。麟出毙矣，吾道其穷。既歌以哀，复史以彰。匪徒物感，实为世伤。”张楷序事在“十四年庚申”，是沿用卷首所引朱熹《论语序论》而来，引文见《孔丛子·记问》。

“夫子泣麟”之事，《史记·孔子世家》《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孔子家语·辩物》皆有记载，以《孔子家语》和《孔丛子》记载最为详细，但二者所记略有不同。《孔子家语·辩物》的记载为“叔孙氏之车士曰子锄商，采薪于大野，获麟焉，折其前左足，载以归。叔孙以为不祥，弃之于郭外，使人告孔子曰：有麋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观之，曰：麟也。胡为来哉！胡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衿。叔孙闻之，然后取之。子贡问曰：夫子何泣尔？孔子曰：麟之至，为明王也。出非其时而见害，吾是以伤焉。”也就是说《孔丛子》所记，孔子见到麒麟时，麒麟已死。张楷《圣迹图》取此，故而画面中央的麒麟是仰倒而毙的样子（参见图1）。《孔子家语》所记孔子赶到时麒麟还活着，只是“折其前左”。吴嘉谟（1570—1620）《孔圣家语图》取此，画面中央的麒麟俯卧在地，折其前左足（图2）。



图二

再看王振鹏《圣迹图》“夫子泣麟”图，恰好又与张楷《圣迹图》一样，也是选取了《孔丛子》。俞和序赞“十四年，孔子居鲁，西狩获麟。叔孙氏弃之五父之衢。冉有告曰：麋身而肉角，岂天之夭乎？夫子往观焉，曰：麟也。麟出而毙，吾道穷矣！赞：王降而伯，雅亡而风。麟出毙矣，吾道其穷。既歌以哀，复史以彰。匪徒物感，实为世伤。”没有照抄张楷序赞，但明显是节略自张楷序赞。“十四年，孔子居鲁，西狩获麟”增加了一句“孔子居鲁”，省略了“鲁西狩获麟”的“鲁”字，直接读下来还以为是孔子西狩获麟。

其他各图序、赞基本类似。张楷《圣迹图》序赞文字较多，序事详细；王振鹏《圣迹图》序赞明显简略。如张楷《圣迹图》“学琴师襄”图序赞“孔子学琴师于襄，十日不进。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曰：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可以益矣。曰：未得其人也。有间，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颀然而长，眼如望羊，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文王操也。赞：圣无不知，奚襄是师。曰取其专，以探乃微。得数得志，复得其人。声入心通，大兮圣神。”王振鹏《圣迹图》“学琴师襄”图序赞“孔子学琴师于师襄，十日不进。襄子曰：可以益矣。曰：未得其数也。有间曰：未得其志也。有间曰：未得其人也。穆然深思焉，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人矣，非文王无能为此也！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赞：圣无不知，奚襄是师。曰取其专，以探乃微。得志得数，复得其人。声入心通，大兮圣人。”序事部分简单过甚，有些句子已经不可理解。赞文部分原“得数得志”变成

了“得志得数”与上文语句顺序不合。原“大兮圣神”变成了“大兮圣人”更口语化。

从王振鹏《圣迹图》“受乐去鲁”图及序赞,推测其底本应为明万历时期的作品。

正统九年(1444)张楷《圣迹图》是先有手卷粉底(2010年保利拍卖会首现,现藏孔子基金会),然后刻石,以拓本的形式传布于世(正统十年墨拓本,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再后又有木刻本。成化二十一年(1485)衡州长府何珣得到一部刻本,“惜其传之不广,且历岁既久,中间人物字画不无磨灭,乃命画工仿佛而一新之。其图首序事及赞词一仍其旧,又尝推类考之他书,有可纪而未及纪者九事,相与核实并增入之,通为一秩。”<sup>①</sup>未及完工何珣去世,由柯汉等僚属尽力完成增补刻本。明吉藩(朱见濬)绘本(1995年嘉德拍卖会明吉藩所藏彩绘本)、刻本(弘治十年)都是何珣增补本。正德元年(1506)孔子五十八代孙孔公才(1458—1533)在扬州府江都县所刻《圣迹图》(已佚)来自明吉藩。明沈藩朱胤柝嘉靖二十七年(1548)刻本源自正德元年孔公才刻本。万历十七年(1589)吴嘉谟《孔圣家语图》、万历二十年(1592)孔庙圣迹殿112幅《圣迹之图》石刻,都明显受到孔公才刻本的影响。这些都是由张楷《圣迹图》扩张衍变而来,演化轨迹基本清楚。

张楷《圣迹图》(手卷)二十九事,其中三事为异时并图,画幅较宽。“夹谷会齐”包含“夹谷盟会”和“归田谢过”两个场面。“受乐去鲁”包含“女乐文马”和“因膳去鲁”两个场面。“丑次同车”包含“同车次乘”和“孔子去卫”两个场面。后转为石刻或册页时多被分割为两幅,形成所谓一事二图(其中一幅无序赞)。也就是说,初期张楷《圣迹图》当为二十九事三十二图,如孔府藏弘治年间彩绘本等就是如此。

万历前后,有的册页或石刻追求画幅匀称划一,一事一图,将原图合二为一,浓缩在一个画幅中,如《孔圣家语图》、孔庙圣迹殿石刻《圣迹图》等。再后来,有的册页或刻本将原来的一事二图分开,各自另立标题,如崇祯二年(1629)《圣迹图》就将原来的“受乐去鲁”图拆分为二,分别为“齐人归女乐图”和“孔子去鲁图”。由王振鹏《圣迹图》“受乐去鲁”图是浓缩“女乐文马”和“因膳去鲁”二图为一来看,其底本应该是万历前后的作品。

竹村则行论文“图二”张楷《圣迹图》“受乐遄行”,其实是孔府藏彩绘本《圣迹图》“受乐去鲁”之二“因膳去鲁”。将其与所谓王振鹏《圣迹图》“受乐去鲁”图(合“女乐文马”与“因膳去鲁”为一)相比较,自然是不合适的。竹村则行论文中在比较两者的序、赞时,用《孔宅志》所载张楷《圣迹图》赞词,与所谓王振鹏《圣迹图》赞词相比较,由此得出张楷《圣迹图》晚于王振鹏《圣迹图》的结论,也是明显不恰当的。论者显然不知张楷《圣迹图》有先后两套赞词。

## 二、张楷《圣迹图》赞词的异同

如上所述,张楷《圣迹图》先后有正统九年(1444)本和成化二十一年(1485)何珣增补本两个系统。正统九年本二十九事有序有赞,何珣增补本所增补九事有序无赞。就赞词看,两个系统共有二十九首一套赞词。赞词(除卷首“述中庸赞”外)都是四言八句,各种石刻本、木刻本、彩绘本基本相

<sup>①</sup> 关于何珣增补本的年代,因日本重刊吉府本修改了柯汉跋的时间,前此多以为是弘治十年(1497),其实应该是成化二十一年(1485)。这不仅有新发现的明吉藩所藏彩绘本《圣迹图》柯汉跋为证,还有何珣、柯汉任官履历等各种记载为证。详细考证见赵前《明吉藩旧藏彩绘本〈孔子圣迹图〉考略》,载《新闻出版博物馆》2015年第26期。

同。个别彩绘本有省略,少数石刻本、木刻本有所谓手民之误。另外有两部书籍单独收录有张楷《圣迹图》赞词,一部是明万历时期的《孔圣全书》,一部是清雍正初年版的《孔宅志》。

《孔圣全书》(又名《孔氏全书》)三十五卷,明蔡复赏(生卒不详)撰,最早刊本为万历十二年(1584)金陵书坊叶贵刻本,目录载卷三十一有《圣迹图赞》。查《孔圣全书》卷三十一正文,标题则为“中卷明朝湘王府《圣迹图赞》”。所录不但有赞,还抄录有序事31条,缺“麟吐玉书”“五龙二老”“钧天降圣”“子路问津”三序,与何珣增补本《圣迹图》序事基本相同,略有删减。赞文27条,缺“述中庸赞”“子路问津”赞两赞,赞文与明版张楷《圣迹图》赞文相同。明“湘王”或“湘王府”只存在了14年<sup>①</sup>,距离蔡复赏辑《孔圣全书》近二百年,蔡复赏所言“明朝湘王府圣迹图赞”当属传闻有误,应该是“明朝藩王府圣迹图赞”。如上所述,明藩王中吉藩朱见浚(1456—1527)、沈藩朱胤柀(1531—1549)都有刊刻《圣迹图》的记载。

《孔宅志》十卷,孔毓圻(1657—1723)等修撰,康熙末年修,雍正初刊本(现仅存日本国会图书馆)。卷五“古迹”记载青浦孔宅《圣迹图》石刻历史和《圣迹图旧碑赞》。万历三十六年(1608)张楷曾孙张九德任松江知府,在张九德的支持下,松江人倪甫英依照正统九年拓本重新刻石。康熙十一年(1672),方孝孺(1357—1402)裔孙方正范搜集残石21图,据旧图补刻9图,共计图像30石,另刻孔子世家及题铭6石,由画家陈尹(莘野)摹勒。康熙十九年(1680)全部36石完成,分12木架,度置于青浦孔宅燕居堂。康熙四十四年(1705),康熙南巡路过松江,诸生孔鋹等向康熙帝呈上的礼品中就有墨刻《孔宅圣迹图》一册。清末民初,原石尚存<sup>②</sup>。清末俞樾(1821—1907)所得拓本即此孔宅康熙石刻<sup>③</sup>。

《孔宅志》卷五“圣迹图赞(旧碑)”收录赞文28条(在后面隔几条的位置收录了方正范隶书“述中庸赞”),没有叙事文字。与《孔圣全书》(或明代《圣迹图》)不同的是《孔宅志》“圣迹图赞”每首赞都有了四字题名,分别是:尼山禘嗣、少习俎豆、初筮委吏、载官乘田、问礼老聃、在齐闻韶、学琴师襄、婴沮齐封、杏坛设教、夹谷却莱、诛邪两观、受乐遄行、次乘灵公、寄心击磬、围匡曲解、习礼伐檀、东门贻诮、陈庭辩矢、返蔡迷津、礼衰去卫、临河返驾、在陈当厄、删述六经、楚封见沮、西狩获麟、梦奠两楹、心丧庐墓、汉高崇祀。《孔宅志》“圣迹图赞”所载赞文也与《孔圣全书》(或明代《圣迹图》)不同,多出来一个“一云”或“一作”。主要有如下几首:

尼山禘祠赞:尼山岩岩,鲁邦是瞻。降灵自母,孕圣归男。既验以形,遂征以名。一诚感格(一云:遂命以名,草木震动),万古文明。

围匡曲解赞:虎暴于匡,圣貌偶同。彼方此仇,我适于逢。凤异泉音,麟殊兕迹。匪伊其昏,维圣斯厄(一云:明夷蒙难,今古同厄)。

礼衰去卫赞:嗟嗟卫灵,识凡志淫。耳聆圣语,目视蜚禽。敬驰于中,怠形于色。色斯举矣,义不苟得(一作:何哉彼昏,面圣目鸿。见几遐举,义不苟容)。

① 明湘王朱柏(1371—1399),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二子。洪武十一年(1378)受封为湘王,洪武十八年(1385)就藩于荆州。建文元年四月十三日(1399年5月18日),有人告发朱柏谋反,诏命其赴京师询问,自焚而死,时年二十九岁,谥曰戾。无子嗣,封藩被削除。永乐初年改谥为献。史载“湘献王柏粹美嗜学”,但无有关《圣迹图》的记载。

② 康熙二十年(1681)青浦知县蔺友芳所制《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周流之图》,与此孔宅石刻不同。容专文另述。

③ 俞樾《春在堂随笔》卷七,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9—110页。

所谓“一云”、“一作”应该是指康熙石刻不同于旧碑的地方。其中另有两条没有用“一云”标明不同,但却是康熙石刻最为关键的修改。一条为“夹谷却莱赞”,《孔宅志》著录为“书契而降,流为会盟。齐务力胜,鲁以义申。历阶数语,却莱心惊。享以昭德,止而弗陈。”没有注明“一云”或“一作”,似乎旧碑赞文就是如此。其实明代《圣迹图》(包括《孔圣全书》)所记“夹谷会齐图”赞文是:“齐务力胜,鲁以义先。夹谷之会,善恶著焉。夷不谋夏,正可胜邪。归田谢过,力耶义耶。”

第二条,“受乐遄行赞”,《孔宅志》著录为“望鲁相圣,强齐畏威。女乐文駟,以沮其为。周道游观,不理政事。弁冕而行,俎肉不致。”没有“一云”或“一作”,似乎旧碑赞文自古如此。其实明代《圣迹图》(包括《孔圣全书》)所记“受乐遄行图”的赞文是“望鲁相圣,强齐畏威。用夷遏夏,女乐乃归。邪逐正移,始难终保。邈矣圣迹,厄哉吾道。”

“夷不谋夏”、“用夷遏夏”,在清初为大忌,不得不改。由此我们可以推测这些新的修订版赞词当为入清以后所改。但也可以肯定的是并非方正范等人所撰<sup>①</sup>,因为刻于康熙初年的《圣迹全图》已然如此,四字标题也完全相同,并且给何珣所增加九事也都配上了赞词。

### 三、张楷《圣迹图》的失误与何珣增补本的败笔

张楷《圣迹图》邓燊跋说:“(张楷)尝取《史记》所载夫子出处之迹,择其有关大节者,得二十七事,兼取《家语》所录微在祷于尼山及《孔丛子》所述夫子泣麟二事,绘而为图。每事摘《史记》全语著于其上,各述一赞。”



图三

其实并非完全如此,张楷《圣迹图》卷首“先圣小像”(图3)就是一个特例。它不是故事但属于二十九事之一。它不来自《史记》,也不来自《孔子家语》或《孔丛子》,而是来自一幅传统图画。所

<sup>①</sup> 2012年新发现的青浦《孔子圣迹图》石拓长卷,依然保留着“夷不谋夏”等字句。由此可以断定非康熙十九年孔宅刻石拓片,当为万历三十八年(1608)张九德或更早的刻石拓本。



附“述中庸赞”也不同于其他各图四字八句的赞文,而是四字十六句“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高明配天,覆帟不偏。博后配地,持载无外。四时错运,日月代明。大德敦化,小德川流。文孙子思,积赞先德。敬书卷端,以表圣迹。”很明显,张楷将“先圣小像”当成了孔子及其孙子子思的画像。

其实这幅“先圣小像”或称“颜子从行像”,非常有来历。曲阜孔庙有两块石刻,一块为孔端友(1078—1132)赞助刻于1095年的“先圣小像”(又名“孔子与颜回”,70×135cm,现藏曲阜孔庙圣迹殿)。另一幅为孔瑀赞助刻于北宋政和八年(1118)的“先圣画像”(72×42cm,现藏曲阜孔庙圣迹殿)。1124年刻、立于浙江绍兴的“孔子像赞碑”也是孔子在前,颜回在后。三幅“颜子从行像”画面相似,刻画二人,孔子前行,颜回拱手相随其后,据说为顾恺之(348—409)所绘。蒙古本《孔氏祖庭广记》卷首附“圣像小影”,旁题“颜子从行”(图4)。卷八“先圣小影”解释说:“今家庙所藏画像,衣燕居服,颜子从行者,谓之小影,于圣像为最真。”<sup>①</sup>这幅图像明显画的是孔子与颜回,张楷《圣迹图》确实是搞错了。



图四

张楷《圣迹图》的这一失误在何珣增补本中没有被发现,在明吉藩、沈藩等彩绘本、木刻本中也得以延续。估计是在传到曲阜孔府后被识破。万历十七年(1598)吴嘉谟《孔圣家语图》,卷首舍弃“先圣小像”改用“先圣遗像”(舍弃“颜子从行”改为“孔子行教像”);舍弃“述中庸赞”,改用《祖庭广记》“四十九表”。据吴嘉谟序,《孔圣家语图》所参考的《圣迹图》是其师澹所“过阙里谒孔林”所得。也就是说孔府所藏《圣迹图》可能已经做了上述修正。

不須默一弟顏聖  
離入識言也子行  
乎之心一凡聖顏  
左行激動聖門庭  
右止故性人之  
焉多子性之高



图五

万历以后《圣迹图》都有意识地避免张楷的错误,有些依然保留“颜子从行”,但无一例外地都省去了“述中庸赞”(或代以米芾“大哉孔子赞”,或代以“四十九表”),承认图中所画为孔子和颜

<sup>①</sup> 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85页。

回。同治十三年(1874)孔宪兰刻本《圣迹图》也是以“颜子从行”为首页(图5),为避免误会,特标题“圣行颜随”,并注释说“颜子,圣门之高弟也。凡圣人之一言一动,往往默识心融,故于圣人之行止,多离乎左右焉。”因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孔圣全图》和《孔宅志》只收录二十八首赞文,唯独将“述中庸赞”排除在外。

无独有偶,何珣增补《圣迹图》也出现有败笔。柯汉《圣迹图跋》说得很清楚,何珣等是在张楷二十九事的基础上,“推类考之他书,有可纪而未及纪者九事,相与核实并增入之,通为一秩。”而且申明“新图皆无赞词,不惟不能作,而亦不敢作,尚有以俟夫吾党之善于形容圣人者。”但是国内传世何珣增补本最多只能找到八事八图无赞(麒麟玉书、五龙二老、钧天降圣、命名荣观、化行中都、礼墮三都、返鲁受迎、跪受赤虹)。不少学者提出疑问“何廷瑞所补当为九图,而吉藩彩绘本只有八图。是否吉藩彩绘本丢失一图?经查,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沈藩朱胤移刻本中何廷瑞所补的有文无赞之图,也只有八幅。是否最初的增补是只有八幅?文字记载和实物的差别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一切仍有待考察”<sup>①</sup>。

其实,第九事确实存在过,即“观庙敬器”。日本宽永年间(1624—1643)翻刻明弘治吉藩刊本《孔子圣迹图》(现藏早稻田大学)、日本元禄四年(1691)年《新刊圣迹图》都保留有此图。做张楷《圣迹图》初时手绘风格,一事二图。第一图(图6)画面绘孔子下车正在访问守庙者,对面一水夫提一桶水,大概是要往敬器里注水。画面有8人。第一图有长长的序事“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敬器焉。问于守庙者曰:此谓何器?对曰:此盖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明君以为至诚,故常置之于坐侧。顾谓弟子曰:试注之水。乃注之水。中则正,满则覆。夫子喟然叹曰:呜呼,夫物恶有满而不覆者哉。子路进曰:敢问持满有道乎?子曰:聪明睿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此所谓损之又损之道也。”文字录自《孔子家语·三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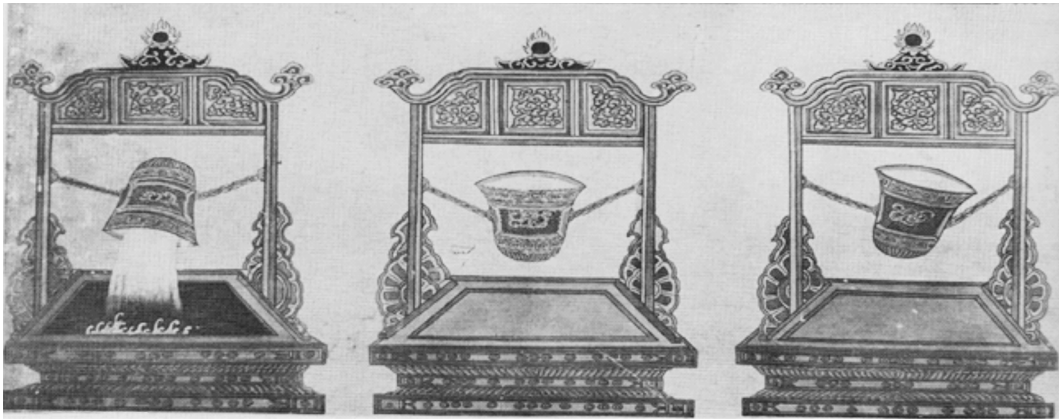


图六

第二图(图7)画面无人,只有三件敬器,表现敬器的欹、正、覆三种状态。此敬器图也有长长的“赞词”:“器虚则欹,是谓不及。道义馁然,来此非僻。养吾浩气,充塞乾坤。卓哉亚圣,大任昆仑。器中则正,不倚不偏。尧舜暨禹,允执相传。心法在兹,万事攸系。始终弗渝,家齐国治。器满则

<sup>①</sup> 赵前《明吉藩旧藏彩绘本〈孔子圣迹图〉考略》,载《新闻出版博物馆》2015年第26期。

覆,是谓太过。富贵尊荣,重璧负荷。奥居动静,礼乐为闲。小心翼翼,周文且叹。”“敬器赞”不同于张楷四言八句的赞,如同“季康币迎”孔子所吟“丘陵之歌”,当为何珣所补,具体来源不明。



图七

何珣所增补的九事中只有这一事为两幅图,序、赞都很长,应该是何珣增补本中最为特殊的一事。但“观庙敬器”构图的失败也非常明显。单看第一图,完全不知所云。序事明明说是“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但画面有车马童仆,俨然是周游途中,不像是在鲁国。第二图只有三架敬器并列,画面非常不美观,艺术性几乎为零。可能因此之故,此一事二图流行不广,国内现存张楷辑何廷瑞补《圣迹图》拓本、刻本、彩绘本,几乎都看不到。

《孔圣家语图》对此图进行了改编,题“观周敬器”。“观周敬器”景物全在庙内,三敬器四人,作孔子问守庙人状。这里有一处艺术化的虚构,三个不同状态的敬器同悬一架,明显较原图画三架敬器简明扼要。当然这也不是吴嘉谟的创意,应该是受孔府无名氏所绘《孔子观敬器图》的启发<sup>①</sup>。此后康熙年间《圣迹全图》、道光年间《圣庙祀典图考》都直接沿用该图,万历二十年(1592)孔庙石刻《圣迹之图》及清初孔府木刻《圣迹图》也都参考了《孔圣家语图》的构思。

(责任编辑:公羽)

<sup>①</sup> 山东省曲阜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曲阜市志》,济南,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620页。